

土耳其研究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

张向荣

摘 要: 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友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起伏跌宕,巴勒斯坦问题、土以两国政局变化、正发党的外交理念等成为长期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正发党继续执政的背景下,土以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冷热不均的状态,但双方的地缘环境、共同利益和相互需要决定了两国关系不会彻底破裂,更不会成为宿敌。

关键词: 正义与发展党;土以关系;“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因素

作者简介: 张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5-0091-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土耳其和以色列是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两个重要国家。长期以来,土以保持着友好稳定的合作关系。然而,自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上台后,土以关系波折不断,步入了新的调整期。

一、土以友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

历史上,突厥人与犹太人长期友好相处,相互之间很少发生冲突和纷争。在漫长的中世纪,不同于欧洲很多国家的“排犹”政策,奥斯曼帝国对境内的犹太人采取开明、包容的政策。在帝国境内,犹太人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并逐渐成为帝国内部重要的经济力量,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不少犹太人还出任帝国的政府高官,甚至成为皇室的医生和金融家。^① 1516年,奥斯曼帝国占领耶路撒冷后,在巴勒斯坦地区

^① 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迁徙自由的政策,哭墙也随之成为法定的犹太人祈祷场所。同时,帝国政府还允许其他地区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①这对已流离失所上千年的犹太人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923年,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新政权延续了帝国时期对犹太人的宽容和保护政策,立法保障犹太人的公民权和财产权,从而吸引了欧洲犹太人移民,使土耳其犹太人的数量出现明显增长。^②20世纪30年代,反犹太主义肆虐欧洲,土耳其政府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使土成为当时犹太人逃离纳粹屠杀的安全通道。以色列建国后,土耳其犹太人可以选择永久定居土耳其,也可选择移民以色列,“土耳其国内每一个想迁往以色列的犹太人都得到了土耳其政府的批准”^③。此外,土耳其还是最早承认并与以色列建交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以色列民众对于这段历史至今仍然普遍心存感激。土以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得益于上述两个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也基于两国的现实利益考量。

第一,土以两国处于相似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之中。以色列从建国之始就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在地区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并把国家安全视为最高国家利益。土耳其虽为伊斯兰国家,但由于历史上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着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对于土耳其人存在深刻的疏离、防范甚至仇恨情绪。土以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是出于抱团取暖、共同打破在中东地区孤立状态的现实需要。

第二,土以两国具有相似的政治制度。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世俗化和西化改革,实施政教分离,推行多党制民主;在文化上则切断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以融入欧洲为最终目标。以色列建国后,虽然犹太教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巨大,但其《独立宣言》明确宣布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而非神权国家,并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土以两国均实行西方世俗的多党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具有诸多共性和共同利益。

第三,土以两国都推行亲美、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均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冷战期间,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土耳其实行亲西方的政策,将土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也极力推动土以两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亲西方的政策和同美国的盟友关系为土以两国友好交往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持。

① 孙正达等:《以色列国》,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② Jacob Abadi, "Israel and Turkey: From Covert to Overt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 15, No. 2, 1995, p. 104.

③ Reuven Kashani, *The Jewish Communities in Turkey* (Hebrew), Jerusalem: The Sephardic Federation in Israel, 1978, p. 78,转引自 Jacob Abadi, "Israel and Turkey: From Covert to Overt Relations," p. 105.

总体来看,土以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相对稳定。虽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土耳其多次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并数次单方面降低对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级别,但这些举措其实是土耳其为安抚国内伊斯兰势力所作出的不开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姿态,实质上土以两国间的政治和外交联系在私下从未真正中断过。^①可以说,双边关系中曾出现的波折并未影响两国的整体关系,土以两国还在某些领域加强了合作关系。1996年2月,土以建立了事实上的准军事同盟的关系,签订《土以军事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土耳其允许以色列飞机进入其领空并利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进行飞行训练;土以两国海军船只可以进入对方港口,并举行军事演习;以色列将帮助土耳其空军实现现代化;土以双方进行反恐情报交流和反恐合作训练等。该协议具有明显的针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倾向。此后,土以还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此外,两国民间往来也日益频繁,土耳其一直是以色列公民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简言之,土以两国在正发党主政土耳其之前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双边关系。

二、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土以关系的演变

2002年11月,具有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议会选举中获胜。2003年3月,正发党独立组阁,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出任政府总理,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随之出现重大调整,尤其是土以关系急转直下,开始进入深刻调整的新阶段。

(一) 两国关系龃龉不断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土耳其与美国及以色列的战略分歧凸显,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突出表现为战争期间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的因吉尔利克军事基地。土美关系的恶化对土以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土以两国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在地区问题上拥有大量共同的利益,土耳其国内出现了要求重新界定土耳其外交战略和地区角色的声音。在强调履行北约成员国义务的同时,埃尔多安政府更加注重和协调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尤其体现在土耳其努力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方面。

长期以来,土耳其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基本保持谨慎、低调的态度,尽量在阿以之间保持平衡。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政府积极、高调地介入阿以冲突。2003年,土耳其在联合国高调谴责以色列在加沙修建隔离墙。2004年,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对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的“定点清除”行动为“恐怖主义”。2005年,以色列宣布从

^① 雷钰、黄民兴:《列国志:以色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243页。

加沙地带单方面撤军,土耳其对此表示欢迎,埃尔多安出访以色列,土以关系有所改善。然而,2006年,土以关系因埃尔多安对 Hamas 政权的态度而再度陷入紧张。以色列将 Hamas 定义为“恐怖组织”,埃及、沙特、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也不承认 Hamas 的合法性,埃尔多安却公开承认 Hamas 的合法地位并邀请其高级领导人访问土国,引起以色列方面的强烈不满。以色列认为,正发党政府此举明显是在偏袒 Hamas。2008年,在两国高层的努力下,土以关系出现缓和。同年5月,在土耳其的积极斡旋下,以色列还与叙利亚进行了五轮对话。

2008年12月28日,以色列在加沙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成为土以两国关系变化的重要分水岭。当时,土耳其正在积极斡旋并努力促使叙利亚和以色列重回谈判桌,此前数日时任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访问土耳其时并未提及以军将采取行动^①,此举令自尊心极强的埃尔多安感到异常恼火。2009年1月4日,埃尔多安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访谈时直言以色列而非 Hamas 应该为恶化的加沙局势承担责任,强调土耳其将代表 Hamas 在安理会发言,甚至扬言要将以色列赶出联合国。1月29日,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巴以冲突等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埃尔多安言辞尖锐,情绪激动,最后拂袖而去。这一事件导致土以关系的危机公开化。

达沃斯事件严重冲击了土以关系,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感。^②土耳其和以色列并不愿双方关系继续恶化。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土以关系再次下滑。2009年10月,一部反映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屠杀巴勒斯坦平民的电视剧《告别》在土耳其电视频道播出,引发土耳其社会强烈的反以和反犹情绪。以色列外长利伯曼随后召见土驻以大使,向土耳其方面提出严正抗议。2010年1月,土耳其另一部渲染以色列军队残暴行径的电视剧《狼谷埋伏》公映,再次引发以色列的强烈抗议。以副外长阿亚隆召见土驻以大使,在会谈中故意安排土耳其大使坐在较低的椅子上,并且在会谈的桌子上只摆放以色列国旗,以此羞辱土耳其,此举招致土耳其的严正抗议。事后以色列向土耳其道歉,国防部长巴拉克为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专门出访土耳其,但埃尔多安拒绝会见巴拉克。^③此后,土以关系进入了持续恶化的阶段。

2010年4月7日,埃尔多安在法国访问期间直接称“以色列是中东和平的主要

^① Casey L. Addis, *Israel: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157349, February 2011, p. 18.

^② Taha Özhan, “Turkey, Israel and the US in the Wake of the Gaza Flotilla Crisis,” *Insight Turkey*, Vol. 12, No. 3, 2010, p. 9.

^③ Ziya Meral and Jonathan Paris, “Decoding Turkish Foreign Policy Hyperactivit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4, 2010, p. 82.

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尽管以色列已经习惯了土历届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所持的批评立场,但埃尔多安如此强硬的措辞仍然令以色列感到震惊和愤怒。以色列对土耳其的信任开始动摇,日益感到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致使以色列对土耳其的政策渐趋激进。^① 同年5月31日,“袭船”事件将土以外交危机推向高潮。一支由土耳其民间慈善机构组织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试图突破以色列的封锁驶往被以军围困的加沙,以色列海军在公海强行登船检查,致使八名土耳其公民和一名美籍土耳其人死亡。以色列的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土耳其的态度尤其激烈。事后,以色列拒绝向土耳其道歉,并将船队中的部分土耳其人称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对此进行了激烈回应,不仅驱逐了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宣布土以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别,而且中止了双方一切军事协议的进一步实施,并冻结了土耳其同以色列达成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订单。同时,埃尔多安宣称将向地中海东岸派出军舰,并在未来再派船只赴加沙声援巴勒斯坦。自此,土以关系跌至冰点。

(二)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以关系的新发展

2010年底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导致中东地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深刻影响了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政治地缘环境。“阿拉伯之春”削弱了埃及和沙特等中东地区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令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重要变化,^②地区动荡和美国战略东移导致地区权力出现真空状态。土以两国对“阿拉伯之春”持不同立场。土耳其对此持欢迎、支持态度,^③认为阿拉伯民众的“觉醒”和专制政权被推翻代表了中东民主化的重要进展,对土耳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正发党认为,世俗民主制和温和伊斯兰相结合的“土耳其模式”有望成为阿拉伯国家效仿的榜样。土耳其试图利用中东变局谋求其在中东事务中的主导权,正发党政府逐渐放弃了之前注重协调同周边国家关系、尽力减少冲突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开始积极介入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内部事务,要求所谓的“独裁政权”下台,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强硬,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激进。以色列对“阿拉伯之春”的态度不如土耳其乐观,认为这很可能是中东新一轮动荡的开始,尤其担心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力量的上升将威胁地区稳定和安全。内塔尼亚胡政府强

^① Tarik Oğuzlu,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urkey-Israel Relations: A Structural Realist Account,”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5, No. 2, 2010, p. 282.

^② Kilic Bugra Kanat, “Turkish-Israeli Reset: Business as Usual?,”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0, No. 2, 2013, p. 118.

^③ Nimrod Goren, “An Unfulfilled Opportunity for Reconciliation: Israel and Turkey during the Arab Spring,”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2, 2012, p. 125.

调,以色列应该静观事态发展,在局势稳定前避免采取任何重大外交行动。^① 土以政府对“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地区局势的判断直接影响着彼此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态度。在阿以之间,土耳其更加重视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而以色列在改善土以关系中则采取谨慎立场和观望态度。

近年来土以关系的发展表明,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为他在伊斯兰世界赢得了广泛赞誉。“阿拉伯之春”前期,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和声望持续上升。2011年6月,正发党在议会选举中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提升了埃尔多安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自信心,由此在阿以冲突上更加偏向阿拉伯国家,改善土以关系面临动力不足的局面。7月,埃尔多安宣布将前往 Hamas 控制的加沙地区访问,以打破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封锁。9月,在以色列驻埃及大使馆受到极端分子的攻击,埃以关系紧张之际,埃尔多安选择出访埃及,并将以色列比作“被西方宠坏的孩子”,严厉批评以色列封锁加沙的政策。^② 10月,埃尔多安在访问南非期间指责以色列政府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杀戮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并称“以色列是影响地区和平的威胁,因为它拥有核武器”。^③ 埃尔多安这些激烈的言辞令以色列政府认为,即便向土耳其道歉也改变不了该国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2012年4月,土耳其不顾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反对,行使否决权来阻止以色列参与北约芝加哥峰会,此前,土耳其还曾阻止以色列在北约总部设立办公室。

2012年以来,阿拉伯变局的发展态势导致中东地区形势更趋复杂,以色列对于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担忧日益加深。2012年7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应找到办法恢复土以关系。2013年3月22日,在奥巴马的调解下,内塔尼亚胡致电埃尔多安,为2010年的“袭船”事件道歉,并同意向土方提供赔偿。土耳其曾经提出恢复两国关系的三个条件:以色列向土耳其正式道歉,向死难者家属赔偿,以及解除对加沙的封锁。以色列对出入加沙地带的人员和物资实行限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悬而未决的问题。^④ 正发党政府并未放弃要求以色列放松对加沙封锁的立场,而以色列则坚持自己的安全政策,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值得一提的是,内塔尼亚胡虽然以官方身份为袭船事件道歉,但道歉的措辞仍只关注“事件中失去的生

^① Nimrod Goren, “An Unfulfilled Opportunity for Reconciliation: Israel and Turkey during the Arab Spring,”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2, 2012, p. 126.

^② “Premier of Turkey Takes Role in Regio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2011, p. A5.

^③ Sevket Ovalı and Yücel Bozdağlıoğlu, “Role Theory and Securitization: An Agency Based Framework for Decoding Turkey’s Diplomatic Offensive against Israel,” in *The Turk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3, 2012, p. 24.

^④ Jim Zanotti, *Turkey: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1368, October 5, 2015, p. 29, <https://www.fas.org/sgp/crs/mideast/R41368.pdf>, 登录时间:2016年2月2日。

命”,刻意回避任何可能与巴勒斯坦有关的内容。即便是这种小心翼翼的道歉在以色列内部也存在反对声音。以色列政府内部最亲土耳其的国防部长巴拉克也称“以色列不是为封锁加沙、拦截船只、使用武力道歉,只是为操作失误以及导致失去的生命道歉”^①。

在土以关系龃龉不断的数年间,以色列对于正发党政府的信任度日趋下降,认为正发党在本质上是一个亲阿拉伯的伊斯兰政党,埃尔多安试图通过批评以色列来增强其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力。这一现实导致以色列对与正发党的外交接触态度较为消极。2013年6月,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声中,埃尔多安仍然坚持接见哈马斯领导人。在以色列看来,埃尔多安支持拒不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并持续袭击针对以色列平民的哈马斯,直接挑战了以色列的底线。2014年3月,以色列官员警告称,正发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将加剧土以冲突。有以色列学者认为,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使得土耳其在美国的战略地位急剧上升,可能使土耳其对推动土以关系方面态度冷淡。

2014年5月,土以双方经过秘密谈判初步达成了一项恢复两国关系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以色列向“袭船”事件受害者家庭提供2,000万美元的赔偿。协议只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然而以色列国内选举延误了这一进程。6月,以色列决定在约旦河西岸修建新的定居点,随后在加沙开展地面行动,引起土耳其方面的强烈不满。埃尔多安明确表示,除非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进攻,否则两国关系不可能正常化,^②土以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最终搁浅。此后,埃尔多安多次公开批评以色列,称“那些一直在谴责希特勒的人在野蛮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希特勒”^③。以色列方面也针锋相对,谴责土耳其允许其境内的哈马斯组织策划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呼吁北约对土耳其采取行动。^④ 这些事件表明,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高调介入叙利亚事务,误判形势,政策的消极后果逐渐显现。一方面,叙利亚危机的久拖不决导致大量叙难民经叙土边境涌入土耳其境内,对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导致土耳其与俄罗斯、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关系跌入低谷。与此同时,土耳其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也处于冷淡状态,国内反对党因此指责正发党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土耳

^① Oded Eran, “Israel: Quo Vadis Turkey?,” *Insight Turkey*, Vol. 13, No. 4, 2011, p. 35.

^② “Israel-Turkey Ties Will Not Normalize unless Gaza Assault Stops, Says PM Erdogan,” *Hurriyet Daily News*, July 11, 2014.

^③ “Anti-Semitism on Rise in Turkey: US Report,” *Hurriyet Daily News*, October 15, 2015.

^④ “Israel Slams Turkey for Hosting Hamas Members,” *Hurriyet Daily News*, December 3, 2014.

其外交孤立的困局,要求政府寻求破解外交困局的途径。另一方面,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地区恐怖主义的抬头对土耳其国内安全造成的威胁持续加剧,这为土以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契机。2015 年 10 月 10 日,土耳其安卡拉火车站发生特大恐怖袭击事件,造成 102 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在发给埃尔多安的慰问信中呼吁土以两国联合对抗恐怖主义。此后,埃尔多安明显降低了批评以色列的调门。2016 年以来,土耳其国内多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以色列均发表谴责声明并向土提供援助,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

2016 年 6 月 28 日,土耳其和以色列宣布两国签署恢复完全外交关系的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向“袭船”事件的受害者家庭赔偿 2,000 万美元,土耳其则撤销对涉案以军士兵的起诉;土耳其可以通过以色列指定的港口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和非军事物资援助;可以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控制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加沙修建一所医院、一家电厂和一家海水淡化厂,在约旦河西岸建造一个免税的工业区。可以说,相比之前的激进立场,土耳其作出诸多让步。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曾经多次表示,土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条件是以色列“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如今土耳其不再坚持这一主张,在事实上变为“放松对加沙的禁运”。以色列允许土耳其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必须经过以色列控制的阿什杜德港进行检查。这在 2010 年是土耳其拒绝接受的条件,当时土耳其要求援助物资直接抵达加沙。以色列也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土耳其在加沙地区的重建中发挥特殊作用,土耳其救援物资可在通过检查后输往加沙,使得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有了了一定的发言权。

三、影响土以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

(一) 伊斯兰因素与巴勒斯坦问题

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 99% 以上的国家,巴勒斯坦问题关系到土国内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对于土耳其内政外交有着潜在影响。正发党上台前,土耳其历届政府在阿以冲突问题上长期保持低调态度,实际上是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平衡政策。例如,土耳其在 1948 年阿以战争期间保持中立,阻止本国志愿者参战,在外交上承认以色列,但在以色列加入联合国问题上持保留态度。1951 年,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一起反对埃及“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决议,土耳其虽然召回驻以外交人员,在官方层面和对外声明上采取亲阿态度,但并未切断与以色列的商业联系,甚至与以色列在私下里加强在情报领域的合作。1967 年,土耳其支持联合国 242 号决议,呼吁以色列从占领的土地上撤军,但也强调要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与阿拉伯国家的态度明显不同。

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埃尔多安并未改变亲西方的战略取向和世俗体制,但伊斯兰因素在正发党政府的政治和外交中仍发挥了比以往历届政府更强的影响力。^① 土以关系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正发党政府改变了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低调态度。埃尔多安试图将伊斯兰教作为争取中东地区领导权的政治工具。^② 埃尔多安曾这样描述土耳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不能对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和加沙视而不见。……我们不得不承担起土耳其历史和人民意愿所赋予土耳其的保护该地区穆斯林的责任。”^③事实表明,土耳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转变与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产生了冲突。2011年9月12日,埃尔多安作为15年来首位访问埃及的土耳其总理,在埃期间受到热烈欢迎,并发表“对全体阿拉伯人民”的讲话,称土耳其和埃及是兄弟。此后,埃尔多安先后访问处于动荡中的突尼斯和利比亚,甚至公开声称希望访问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近些年来,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得坚持世俗主义的政党都不愿贸然挑战伊斯兰力量。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中对佩雷斯的激烈言辞得到了土耳其社会的热烈欢迎,即使是国内的政治对手也公开表示支持。^④ 以色列认为,土耳其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目的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及谋取伊斯兰世界对其领导权的认可。^⑤ 美国前驻土耳其大使詹姆斯·杰弗里和以色列前驻土耳其大使加比·莱维均认为,土以关系恶化是埃尔多安基于宗教理由对以色列的憎恶所致。^⑥ 自土以建交以来,伊斯兰因素和巴勒斯坦问题对两国关系影响一直有限,但埃尔多安执政以来,二者成为影响土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二) 土以国内政治及公众舆论

土耳其军队历来有干政的传统,并以“凯末尔主义”的忠实捍卫者自居,坚持世俗化和西方化的政治原则。土耳其军队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凯末尔确立的世俗制。^⑦ 在土耳其军方看来,拥有尖端军事科技和同样亲西方和坚持世俗化的以色列,是土耳其加强国防力量、抑制国内政治伊斯兰、维护世俗制的天然盟

① 孔刚:《勉为其难的盟友——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评述》,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4期,第89页。

② Ofra Bengio, “Altering Interests and Orient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urkey: A View from Israel,”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2, 2009, p. 44.

③ *Ibid.*, p. 48.

④ Gohan Bacik,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after Davos: A View from Turkey,”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2, 2009, pp. 34-35.

⑤ Anat Lapidot- Firilla, “Sinking Turkey-Israel relations,” *The Jerusalem Post*, January 6, 2010.

⑥ “Israel, US agree: Turkish Gov’t ‘Hates’ Israel,” *Hurriyet Daily News*, November 29, 2010.

⑦ Yücel Bozdağlıoğlu and Sevket Ovalı, “Role Theory and Securitization: An Agency Based Framework for Decoding Turkey’s Diplomatic Offensive against Israel,” in *The Turk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3, 2012, p. 15.

友。因此,土耳其军方积极发展与以色列的军事和安全关系,在 1996 年土以缔结军事联盟中发挥了主要作用。^① 埃尔多安上台后,尤其是在 2010 年以来,执政基础稳固的正发党采取了一系列制约军队权力的动作,政府逐渐实现了对军队的管控。主张与以色列加强军事合作的军方逐渐失去了对土耳其政治的控制,无力影响政府对外政策。

此外,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土耳其国内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教对社会和媒体的影响日益上升。土耳其国内媒体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报道往往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的报道被反复渲染,但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平民的事例则鲜有报道。^② 土耳其民众同情同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反以和反犹情绪日益增加,土耳其国内两部反以色列电视剧的流行就反映了这种舆论倾向。公众情绪对土耳其各党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是最为反对政治伊斯兰倾向的共和人民党也不能不顾及社会舆论。2002 年 4 月,共和人民党出身的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将以色列围困阿拉法特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③尽管他很快为此向以色列道歉,但仍助推了土耳其国内反犹太主义的兴起。2010 年“袭船”事件发生后,土耳其国内的反以、反犹情绪达到高潮,甚至一度超过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各大城市爆发反以游行示威,焚烧以色列国旗。2015 年 10 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称,“近些年来土耳其的‘反犹太主义’一直在上升”^④。正发党执政以来,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走向发挥了重要影响。

近年来,以色列国内政党破碎化现象突出,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多数党,在对土耳其的政策上,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重视与土耳其的关系,但不满土耳其对以色列中东政策的指责和批评;国防部长巴拉克将土耳其视为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竭力避免与土耳其敌对;外交部长利伯曼则对正发党政府缺乏信任,主张强硬应对土耳其,^⑤政府内部的分歧使得以色列往往对土耳其发出不同的信号。2008 年大选期间,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需要,决定不与叙利亚谈判,^⑥使当时正在调解叙以关系的土耳其非常不满。与此同时,以色列民众对土耳其的负面印象也在上升。达沃斯事件之后,以色列几家报纸号召以民众抵制土耳其商

^① Ofra Bengio, "Altercating Interests and Orient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urkey: A View from Israel," p. 44.

^② Ibid, p. 46.

^③ Michael B. Blshku, "How Has Turkey Viewed Israel?," *Israel Affairs*, Vol. 12, No. 1, January 2006, p. 190.

^④ "Anti-Semitism on Rise in Turkey: US Report," *Hurriyet Daily News*, October 15, 2015

^⑤ Ufuk Ulutas, "Turkey-Israel: A Fluctuating Alliance," *SETA Policy Brief*, No. 42, January 2010, p. 9.

^⑥ Oded Eran, "Israel: Quo Vadis Turkey?," *Insight Turkey*, Vol. 13, No. 4, 2011, p. 33.

品。以色列电视台第十频道贬损伊斯兰教先知的节目也激怒了土耳其民众。埃尔多安通过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来迎合国内选民的倾向非常明显,这种态度加剧了土耳其社会的反以情绪,也刺激了以色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 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的外交理念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为其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动力。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任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的影响。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的外交不乏明显的宗教动机,也具有极强的实用主义。当土耳其寻求加入欧盟的努力受阻时,正发党政府便开启了面向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大门。^① 达武特奥卢任土耳其外交部长后提出“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在坚持加入欧盟的同时实行“东进”政策,一改以前的亲以政策,逐渐向伊斯兰世界靠拢,并与伊朗改善关系,试图以一种更为平衡的角色介入中东事务;土耳其从注重安全转向注重经济和发展,积极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与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先后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土耳其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以色列看来则是土耳其在土以关系中制造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以色列要容忍伊朗核问题、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合作以及承认哈马斯激进势力。^② 一直以来,土耳其认为“通往华盛顿的道路要经过耶路撒冷”,^③与以色列的友好关系是土耳其加强与美国关系的必要前提。正发党上台以来,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虽然埃尔多安一再强调要恪守北约成员国义务,但在外交上对美国的独立性非常明显,西方一些观察家认为土耳其正在偏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可以说,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转向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外交理念直接影响着土以关系的走向。

四、土以关系的前景

20世纪末形成的土以军事联盟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后,中东和平进程取得明显进展,长期困扰土以关系的外部障碍消失。20世纪90年代中期,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国对土以两国构成安全威胁,“两国被流氓国家、敌对国家包围的共同认知导致土以两国将彼此视为盟友”^④。但是,土以军事协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虽然其

^① Umur Uzer,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Their Rise and Fall,”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0, No. 1, 2013, p. 104-105.

^② Oded Eran, “Israel: Quo Vadis, Turkey?”. p. 33.

^③ Kadir Ustun, “US-Turkey Relations: Arab Spring and the Search for Model Partnership,” *SETA Foundation*, May 2012, p. 5.

^④ Ufuk Ulutas, “Turkey-Israel: A Fluctuating Alliance,” p. 4.

潜在目标是为了对付叙利亚和伊朗,但没有具体的针对别国的条款,也没有规定关于共同防务上彼此应承担的义务。土以双方都担心卷入与己无关的军事冲突中。^①正发党执政的前两个任期内(2011 年之前),土耳其与地区敌对国家的关系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土以在对中东局势的看法和在两国在中东的利益分歧越来越大,导致两国军事联盟的基础遭到削弱。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软硬实力显著增强,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稳步上升,所谓的“土耳其模式”引起了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土以之间的军事联盟从开始就遭到阿拉伯国家普遍的怀疑和反对,而正发党将奥斯曼遗产和伊斯兰教纽带视为土耳其外交的重要资源,不再将阿拉伯国家视为潜在的敌人,相反将其视为土耳其崛起的战略依托,在阿以之间更倾向于阿拉伯国家。这是正发党执政以来土以关系趋于恶化的深层原因。

相似的地缘环境、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相互需求使得土以关系在 2010 年“袭船”事件后并没有彻底破裂而走向全面对抗。虽然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分歧严重,但土以双边关系本身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双方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彼此之间并未对对方构成战略威胁。^②土以两国在经济结构上具有互补性,这使得近些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增长迅速。尽管受到“袭船”事件影响,两国贸易额仍然从 1996 年的 4.49 亿美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44.4 亿美元。^③土以两国在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也存在共同利益。例如,双方都不愿意看到叙利亚危机扩散,表面上土耳其理解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主张,但两国都担心伊朗真正拥有核武器。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很多问题上仍然需要相互支持。以色列需要保持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以打破自身在中东的孤立状态;土耳其要想通过介入阿以冲突提升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也离不开以色列的理解和配合。美欧等西方国家动辄以人权问题和库尔德问题为由,拒绝向土耳其提供军事装备,使得土耳其的尖端军事装备和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以色列。土耳其还需要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利用美国国内强大的犹太游说集团来协调土美关系。土以关系恶化后,土耳其驻美国的一名外交官说:“我们过去常常被美国的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游说集团攻击,犹太人游说集团则保护我们,但是现在犹太人游说集团也加入了攻击我们的行列。”^④

^① Efraim Inbar, “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Israeli-Turkish Strategic Partnership,”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 No. 2, 2001, p. 48.

^② Ofra Bengio, “Altercating Interests and Orient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urkey: A View from Israel,” p. 47.

^③ “Turkey-Israel Trade Volume Rises by 135 Percent under AKP Government,” *Hurriyet Daily News*, February 25, 2009, quoted from Matthew S. Cohen and Charles D. Freilich, “Breakdown and Possible Restart: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 under the AKP,” *The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 8, No. 1, 2014, p. 41.

^④ Jim Zanotti, “Turkey: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p. 33.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在中东改变了原来的“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转向冒进的介入政策,尤其体现在叙利亚危机上,土耳其以推翻阿萨德政权为目标,与叙利亚关系破裂;2011年9月,土政府同意在部署北约新型导弹检测系统后,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开始降温;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与伊朗关系进一步恶化;2013年,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后,支持穆兄会的埃尔多安政府与埃及塞西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此外,阿拉伯国家对于土耳其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土耳其重返中东常常被视为“新奥斯曼主义”的抬头。事实证明,土耳其疏远以色列、向阿拉伯国家靠拢的政策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当前,土以两国都感受到来自伊朗、叙利亚和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的共同威胁,再次面临着与20世纪末类似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是近一年来土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动因。事实上,以色列并不信任正发党政府,认定正发党的外交政策受到宗教动机的驱动,一度将改善土以关系的希望寄托于土耳其国内其他党派。然而,当前土耳其国内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伊斯兰复兴渗透至社会、经济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土耳其国内主要党派、媒体乃至非政府组织大多对以色列充满敌意和反感,在这种政治气候中,不管哪个党派上台都不可能推动土以关系方面迈出太大的步子。此外,阿以和平进程前景依然黯淡,仍会成为未来影响土以关系的重要因素。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中东乱局分散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注意力,伊斯兰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内部纷争也使得以色列的地区安全威胁暂时得以缓解,以色列对于加强土以关系的愿望已经不如之前那般迫切。

土以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将加强在经济、贸易、能源方面的合作,并有可能在联合反恐和共享情报方面开展合作。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土以关系很难再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蜜月时期”,恢复以往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也较低。在地区格局深入调整和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动的当下,土以两国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关系模式,以应对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地缘政治变化。

(责任编辑:赵 军)